

## 检讨和自白:真诚的,抑或无奈的?

——评竺可桢的自我检讨和内心自白

○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北京 100049)

[摘要]在竺可桢的后半生,由于时代的乖戾,他也做了一些乖戾的自我检讨和内心表白。本文着重论述了这种检讨和自白的背景、特点以及他思想觉悟提高后的新认识之乖谬。知识分子应该由此汲取教训,恢复中国古代士人和民国时期学人的优良传统,并进而提升个人和群体的风骨和操守。

[关键词]竺可桢;自我检讨;内心表白;人格和良知;汲取教训

大凡经历过文革十年和文革之前十七年的人,尤其是知识人或知识分子,没有写过、做过思想检讨或交心材料的人可以说是寥若晨星。竺可桢(1890—1974)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他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且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鉴于我已就竺可桢1950年前的科学观、教育观以及他在1950年前后的思想断裂撰写了三篇研究论文<sup>[1]</sup>,故本文仅专门分析和探讨竺可桢的自我检讨和内心自白及其对人们的启示。

### 一、检讨和自白的背景

在《竺可桢全集》第3卷和第4卷(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1974年)中,专门的自我检讨和内心自白文字至少有四五篇,也有一些零散文字散见于其他文章或讲话。竺可桢之所以集中写这些材料并不时触及灵魂,其背景或原因或动机大致有四个方面: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积极要求政治进步,极力紧跟革命形势,下定决心申请入党。

---

作者简介:李醒民(1945—),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一)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指1951年秋至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951年9月,北京大学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并在北京、天津各个高校推广开来。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派,向两市高校教师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阐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或目的,号召知识分子站到人民立场上来。其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把运动推向全国。<sup>[2]</sup>竺可桢当时闻风而动,积极投身运动,力图使自己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改造是非常必要、非常需要的:“知识分子若要担任改造世界的重大责任,必得依靠广大的无产阶级,必得归工人阶级来领导。但是知识分子不经过一番切切实实的思想改造,他是无法归入工人队伍里面的。这个改造在我们人民新中国,尤有迫切的需要。我们有广大的疆土,丰富的资源,勤朴而聪明的劳动人民,英明而伟大的领袖,只要知识分子能够把我们的头脑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将会有惊人的力量出现于世界。”<sup>[3]</sup>“中国科学工作者多数过去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在反动统治之下,大多数很少接触过进步思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毛泽东主席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国科学工作者三年来参加了各种工作和学习,获得了丰富的教育。……今年,在毛主席号召之下,许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批评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思想,初步巩固了理论联系实际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sup>[4]</sup>据他说,1952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他在中区小组里曾先后作过两次检讨。几位同志还帮助他分析思想,最后归纳出他过去的主导资产阶级思想在两方面,一是崇美和亲美思想,二是过去的宗派主义。<sup>[5]</sup>

(二)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竺可桢原来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但是在1949年后,由于参与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加之他自觉出身不佳,政治水平低,有跟不上大好形势之憾,遂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阅读政治书籍(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非常想旧貌换新颜,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他坦白:“我们的科学工作人员,尤其年长的科学工作人员,受过长期的资本主义教育,深深地熏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虽然经过了三年来的思想改造,尚未能连根拔除。因此,正确地宣传科学知识是急需注意的一个问题。在宣传科学知识时,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与资产阶级唯心的科学思想作斗争,这就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必须揭露帝国主义国家驱使科学走向灭绝人类的罪恶。”<sup>[6]</sup>他这样描述通过政治学习,力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过六十年半封建时代社会的长期同化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久年熏陶的我,要全盘改造思想或人生观是不容易的事,解放以来已经十二年了,目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等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先后参加了“联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宪法”、“人民内部矛盾”、“总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政治学习,由于党的无微不至的关

怀,我的思想水准还是提高不少,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到改进。<sup>[7]</sup>

(三)极力紧跟革命形势。在1958年大跃进风起云涌之时,竺可桢心情激动、精神振奋,他和几个副院长联合致函科学院党组:“这些日子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使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莫大的鼓舞,我们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跟着工人农民,把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决心根据‘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的精神,做到:一、全心全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苏联科学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迅速推进人民的科学事业。三、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sup>[8]</sup>此后,他狂热地追随浮夸风吹牛皮、放大炮,讲了许多违背常识的昏话,成为浮夸风的俘虏。在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久,从中央到地方,又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誓师大会和现场会,把心交给党的运动席卷全国。此时,竺可桢也不甘落后,他在深刻检查自己所受毒害和所犯错误后,和盘托出自己的一颗赤心:“我应该对党有火般那样的热情,爱护眼珠那么爱护。”“要服从党的领导,要学习马列主义,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要旨,希望大家当作一个小学生看待,时时严厉地给我批评,使我能很快地以一个真的工人姿态出现。”<sup>[9]</sup>此后,他一有机会就继续类似的表白。例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以他为首的十五位著名科学家联合发言:“我们是几个中年以上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反右整风运动以来,经历了我国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见到了科学战线上的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科学才能出现今日的大好形势,也唯有党的领导才能使我国科学事业更加发扬光大。”<sup>[10]</sup>

(四)下定决心申请入党。竺可桢一开始对入党还有点犹豫和迟疑,诚如他自己所说:“关于入党问题,这是一个我一向不敢提的。第一,觉得自己政治水准太低,第二,年纪快要七十了,所以有点望洋兴叹的样子。”<sup>[11]</sup>后来,在党组织有关领导的鼓励和帮助下,在子女的要求下,于是他主动靠拢组织,郑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1961年秋,他在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中写道:“对于我,提出申请是经过一个长时间考虑的。1958年3月8日曾和李、陶、吴三副院长写过一封信给中共科学院党组,说在大跃进时期我们觉得无限兴奋,要把自己一切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做到:一、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经验,推进人民的科学事业;三、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封信发表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当中,自己认为学习还不够努力,而进步也很缓慢,但对于党的认识也加深了一点,虽是年岁已是七十多了,但自己认为尚能受得起更严格的训练,以期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sup>[12]</sup>同时,他还向党组织提交了两万字的长篇自传,无情地剖析自己受到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检讨自己形形色色的错误,同时说明自己通过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转变。1962年6月4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秘

书处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接受竺可桢的申请，同意接收他为中共预备党员。

## 二、检讨和自白的特点

凡是写过或了解当年自我检讨和内心自白文字的人都知道，尽管这些文字在所交代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但是在主要内容、基本形式和语言运用上往往大同小异：除了频频使用一些流行的官话套话和时髦的革命词语之外，有诸多明显的共性和特点引人注目。竺可桢的检讨和自白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将分三个方面胪列、观缕。

（一）揭底家庭出身和本人出身的原罪，深挖阶级和思想根源。

竺可桢自称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在绍兴东关镇经营永茂米行），童年时期受到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青年时代赴美留学，又深受资产阶级教育毒害。因此，他主要是就这两个原罪自我检讨和深挖根源的。他自省：我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大，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个人。青年时代读了《孟子》，很受它的影响。因为《孟子》里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一句话，我便很崇拜他，并且很相信他的两个学说。一个是“人性本善”的学说；另一个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学说。这两个学说对于我的人生观或是立场发生过很大影响。前者影响到谁是敌人谁是友人的问题。后者影响到归谁领导的问题。民国前一年我去美国求学，八年的美国大学教育并没有使我的立场和观点起多少变化，但崇拜美国物质生活的心理增加了我的享受物质生活的欲望。我所学的是自然科学。回国以后，经过了八年的北洋军阀内战时期，和二十二年蒋宋买办政府的统治时期，我虽然心里痛恶政府的贪污腐化，卖国殃民，却是一筹莫展。只好在大学里、研究院里埋头不问政治。以为科学是超政治的，教育是超政治的，甚至大学本身也是超政治的。<sup>[13]</sup>六年后，他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类似的话：“我年幼时考过科举，做过八股文，中了很深中国士大夫阶级观念的毒。十九岁出洋，留美八年（1910—1918），拜倒于美国的物质文明，所以在我的脑筋里深深地打下了两个烙印，一方面看不起农工大众，一方面无原则地崇拜英美。……”<sup>[14]</sup>

1952年，竺可桢积极参与思想改造运动，在一篇自我检讨中重点剖析了他的崇美和亲美思想的全过程，以及所受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毒化教育。他首先胪陈崇美和亲美思想的形成：当年，美国总统老罗斯福采用了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 J. James）的阴险建议，把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后美国所榨取的赔款，用来作为文化侵略工具，大批派遣赴美的留学生，那时年青学生全不知道这种诡计反而趋之若鹜。我就是当时这一群青年当中的一个，于1910年的秋天去美国。起先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读气象学。哈佛大学是私立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极为保守而反动。在哈佛大学五年，养成了我浓厚的崇美和亲美思想。给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前后任两个校长的言论。哈佛大学那时校长是罗惠耳（Albert L. Lowell），他是有名的政治学教授，在校素来以“学术自由”相号召。所谓学术自由在美国学术界认

为是一件极重要的东西,比生命金钱还要重要。罗惠耳是美国主张学术自由很力的一个人,在他任内我可以举一桩事来说明他所标榜的所谓学术自由。1919年,哈佛所在地剑桥和波士顿两城的警察因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哈佛是资本家所开的学校,所以全校大多数人对于警察统不给以同情,唯有一位英国籍的讲师赖斯基(Harall Laski)公开出来为警察说公道话。一时哈佛大学的校友和资本家纷纷写信给罗惠耳,要求他辞退赖斯基,罗惠耳就以学术自由为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哈佛的校友常引此事以赞美罗惠耳。……但影响我比罗惠耳更大的是他前一任校长伊理阿特(Charles Eliot)。他是我国所通行选课制首先推行最力的一个人,从1869年到1909年做了四十年的哈佛校长。他把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学校,在他任内变为世界有名的学府。他是有名的改良主义者,他在美国麻省的威望尚在那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之上,他于1911年受卡纳奇国际和平基金之命来中国、印度、日本走了一趟。回国后曾印行了一本书叫《和平之路》(1913年出版),他说他相信中国能成为一个富强国家,因为中国人具备有三种条件:一说中国民族的自觉性,二说反对异族(如满族)统治的强烈性,三是痛恨西方列强一百五十年侵略的一致性。他认为列强所占有的租借地能一律废除,则世界和平应近乎有希望。他这种议论使我们年青的中国学生听了非常兴奋,真使我五体投地。那时哈佛又有不少名教授,地理教授台维斯(Wm. M. Davis)、地质教授达莱(R. Daly),统是世界上的权威,旁的理科科目以及法律、经济、哲学每科中均有特出人才,引起我对哈佛的崇敬心。哈佛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无论在哈佛校刊上或是波士顿城的日刊上,常把哈佛校训来鼓吹。我不知不觉便成为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俘虏。我认为哈佛为我的母校,我回国以后在大学里教书,或是办行政,在研究院办研究所,常把哈佛大学做我的标准,哈佛大学便成为我的偶像。

接着,竺可桢检讨了崇美亲美心理的发展。我在哈佛所学到的,除追求高度享受而外,在思想上沾染上了两种主流思想。一是学术自由,这养成了我的极端自由主义,不肯服从纪律,以自由为名而趋于极端的自私自利。另一种思潮即是超政治观点,以为学术,甚至于教育,是超政治的。人生蕲求的是真理,至于为谁服务是次要的,这就养成了我的纯技术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给予我的这两种观点,于我回国以后立身行事是有极大影响的。1918年回国以后,最初两年在武昌高等师范,1920年到南京高师,不久即改为东南大学。我在这两校教课是地理和气象,全盘贩卖我在美国所获得的一点知识。到了1927年反动国民党政府成立伪中央研究院,任蔡元培为院长,杨铨为总干事。我应蔡先生之邀,担任了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从此我便成了反动政府的一个成员。中央研究院原是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装饰品,与国计民生毫不发生关系,最大的目的就想要追上国际水平,大部分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有时还寄到美国欧洲去发表。我到浙大以后,把浙大的校训改为“求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保存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名称,实际我却在模仿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我尽力提倡学生读死书不

要问国事，这暗中却为反动政府安定学潮，而同时却符合于我的纯粹技术观点。对于哈佛大学的制度，我是亦步亦趋尽力采用，如导师制即其一例。我也提倡学术自由，提出教授治校的口号。自从1918年离美国以后一直到解放，三十一年间我和哈佛大学一直是有联系的。最初是和我的老师华德通讯。华德死后，我和我的同学、现在哈佛大学蓝山气象台台长勃洛克司(C. P. Brooks)有不绝的联系，我还派了气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到勃洛克司那边去做工作。解放以前十多年来，我一直订阅《哈佛同学会会报》，而且每期统仔细地看了。我到杭州以后就成立了杭州哈佛同学会。1936年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中国哈佛大学同学会以宋子文的号召，大家捐款，买一块白石的赑屃碑送给哈佛大学，我也捐了款。我与1933年出席加拿大科学会议。1947年出席巴黎科学会议时，统绕道去了美国，而且在麻省剑桥居留了一个时候，对于哈佛大学有留恋不舍之意。1947年3月间我还被邀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同学会大会作了餐后演讲。在我那篇演讲里，我赞美了前任校长伊理阿特所提倡的求是精神，以为只有像他那样存心公正竭力为全人类服务，世界才会有永久和平。1947年夏天，我被推为哈佛大学同学总会副会长（远东区）之一，这是十足买办性的一种职务，但那时我却引以为荣。

最后，竺可桢剖析了自己崇美亲美观念至于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由于幼年出洋，留美又相当长久，回国以后又不与人民大众相接触，亦不读政治、经济著作。只用技术观点，想做好工作，从不注意到为谁服务问题。他表示：“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日暮穷途面临危机的时刻。我过去的崇美亲美观念到此有渐变而为恨美鄙美的趋向。”<sup>[15]</sup>

1961年，竺可桢又在思想自传中叙说了相同的过程和类似的话语。无论从当时的境况或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给别人或自己罗织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即便受到某些不良的影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更不是什么罪责。至于因为留美滋生“享受物质生活的欲望”、“看不起农工大众”的坏作风，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就竺可桢的人生经历而言，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行事的。由于事实十分清楚且道理十分明显，我们就不针对每项检讨一一分析、辨正了。在这里，我们只想按检讨文字的顺序提几个问题，供读者思考。我们相信，读者肯定会给出正确和公正的回答的。美国利用庚子赔款让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是纯粹“作为文化侵略工具”，还是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科学家和学人？哈佛大学是“保守而反动”的吗，其两任校长是“反动”的吗？“学术自由”和科学、学术、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超政治观点”有什么不好？中央研究院以及气象研究所是“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装饰品”，还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里程碑？浙江大学模仿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而改校训为“求是”，到底错误何在？与母校哈佛大学“有不绝的联系”和“留恋不舍之意”原是人之情，这到底有什么过错？被推为哈佛大学同学总会副会长之一，本是校友对竺可桢个人和中国的信任和荣誉，怎么是“十足买办性的一种职务”，即便“引以为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要知

道,正是从哈佛大学学到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及学术自由、学术独立、教授治校等办学经验,竺可桢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建中国史无前例的气象研究所;也正是因此,他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才能把浙江大学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大学办成全国知名的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对竺可桢而言,哈佛大学究竟是毒饵,还是美食,岂不是一清二楚。

(二)挖空心思,甘愿地给自己罗列错误、罗织罪名。

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所谓有“问题”(历史的和现行的)的人往往得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给自己罗列一大堆错误和罪责,并且还得深挖猛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才能够比较顺利“过关”,否则便被革命群众指责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并被列入“另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为了过关或自保,竺可桢其时也未能免俗,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苦心搜罗,把自己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请看他自己是怎样给自己罗列错误和罗织罪名的:基于我过去的历史背景(我有两个连襟统是国民党时代的大官僚),我的“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五气”(官气、暮气、阔气、傲气、娇气)是根深蒂固的。我很想革除这丑恶的习惯,但在言语行动中仍不免受影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于我为害更大。主观主义差不多支配了我的一切行动、习惯。同时我非常保守。我的事务主义太严重,没有能从大处着想,没有能及时地就纠正错误,因此终日忙碌,一无所成。在大政方针上我自己知道我不能掌握,但又不能靠近领导和党,所以许多事情就没有办好。同时我又不善于向群众学习。<sup>[16]</sup>“到现在为止我的‘科学救国’和‘贤人政治’的观念,自以为已经彻底消除,但‘人性本善’的观念多少还在作怪,而自由主义观念怕还是相当浓厚。”<sup>[17]</sup>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我们仅对竺可桢思想自传中的几项检讨或自白做一简单点评。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我完全不了解其重要性,而且已经中了资本主义国家很深的毒,以为像英美的代议政治就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用不着用暴动流血像列宁那样用革命的方式的。”<sup>[18]</sup>如果代议政治能够实现社会制度的进步变革,那么就没有必要非用暴动流血的方式革命了,因为革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引起社会长期失序,给底层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事实上,在国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范例,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化等等。

“在‘五四运动’之后,北方胡适、陈独秀方提倡白话文。东大刘伯明、柳翼谋、梅光迪则提倡复古,并创办《学衡》杂志相抗衡,这实在是一种违背时代潮流的运动。我虽没有参加《学衡》的小组织里,但并没有热烈地提倡白话文,多少也受了《学衡》的影响。”<sup>[19]</sup>首先,没有热烈地提倡白话文虽则有些不合时宜,倒也算不得大不了的错误,且多是个人的学术取向或兴趣所在不同而已,是不值得过分忏悔的。何况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也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根据,且能

多少牵制一下白话阵营的激进派，使其革新的行动更稳健一些，不应全盘否定其历史存在。

“东南大学学制完全抄袭美国，由当时副教务长陶知行的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杜威和孟禄曾陆续来校作几度的讲演，影响学生崇美的心理。理科、农科的教授又提倡为科学而科学，在当时以为能脱离政治是最清高的一桩事。实际是麻痹青年思想，使他们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国计民生，毕业后出去搞小圈子、闹宗派，养成这种学风，像我在东大当教师的人要负很大责任的。”<sup>[20]</sup>学习国外大学的办学长处，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或交流，这种促进科学和学术的活动怎么也是罪状呢？为科学而科学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于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对于技术进展和人类长远的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的持续进步是富有积极意义的；<sup>[21]</sup>使教育相对地独立于政治，才能使教育自主而健康地发展——这怎么会麻痹青年思想呢？

“1930年以后科学社号召了几个专科学会，每逢夏天到四川、广西等省，天南地北地各处开会，每到一处总是受到当地政府盛大招待，所做的事除掉游览风景，征逐酒食以外，就是读多少篇于人民福利没有多大关系的论文。从现在看来这全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当时是科学社理事之一，自然要负相当责任的。”<sup>[22]</sup>中国科学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开端，召开年会是该社团正常而必要的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得也比较规范。中国科学社对中国科学的奠基、发展和普及之功有目共睹，怎么能如此给它抹黑呢？据有关资料，科学社的开支相当多一部分是募集和募捐的，且会计制度和资金管理比较严格，研究人员又注意节俭开支，恐怕不至于干劳民伤财的事情吧？

“1928年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为院长、任杨铨为总干事，叫我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气象是我的本行，我完全为我自己兴趣着想，自然乐于接受的。”<sup>[23]</sup>既是本行，接受所长聘任不用说是顺理成章的。若是抗战危急时期，若是国家急切需要，个人兴趣服从国家大局理所当然。若是平时，全为自己兴趣有何不可？要知道，没有兴趣，是很难干好一件事情的。当然，出自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能把事情做好，那往往也会在干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兴趣的。满怀兴趣从事科学的人，方能甘其忧、享其乐，从而做出瞩目的业绩。

“如今日回想，宗派主义倒是我办浙大的缺点。我到校第一年就引用胡刚复为文理学院院长，梅光迪为副院长，并用张其昀、诸葛麒等七八个东大学生。这是我的严重的宗派主义开始。以后在浙大的东大毕业生，又引用了许多他们同学。在浙大同事中，最多时东大、南高毕业生到了四十人之多，连我自己也觉得这是要不得的一件事。”<sup>[24]</sup>聘用自己了解或可靠的人“组阁”，是任何一个执政者的通常做法，只要这些人德才兼备、认真负责，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算不得宗派主义。当然，如果圈内教师的比例过大，也有近亲繁殖的弊端，从其他高校引进人才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到浙大后，不但把美国哈佛大学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和为‘为学问而学



问’这套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遗毒加以宣扬,而且把过去东大反动守旧的传统也带到了浙大。同时我还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口号。这口号,在东大当时目的在于反对巴结军阀的校长,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我以浙大校长地位提出这口号,就变成联合教员来压制学生。”<sup>[25]</sup>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sup>[26]</sup>为学问而学问与为科学而科学一样,不仅无遗毒,而且有好处。<sup>[27]</sup>教授治校是办好大学的有效途经。历史事实或现实实践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匪夷所思,无限上纲,自轻自贱,自取其咎,自取其辱。

当年,思想改造得彻底的人,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人,已经完全清洗了头脑中的“私心杂念”,换上千篇一律的程序软件,从而变成“焕然一新”的他者。此时,竺可桢就是这样的他者,他似乎完全忘记自我的存在,不惜一切,不计后果,一股脑地抹黑自己,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甚至不惜自己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本来是正人君子的竺可桢,却多次刻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处处“向上爬”的小人:“我年幼时,我大哥已进学做了廪生,使我无限地羡慕,养成我向上爬的人生观。……上海是租借地,半殖民地空气极为浓厚,眼见英美人趾高气扬,我们国家物质文明事事落后,又眼见日本维新变法以后,已渐渐抬头,因此一心一意地想考出洋去留学。这是我希望向上爬的一种表现。”<sup>[28]</sup>“科举虽然废除了,在我心目中士大夫阶级的尊严还是存在的。……在理论上我赞成排清灭满,应该站在孙中山这边的,但是我的立场是要向上爬。”“1935年2月间,杭州浙江大学学生反对校长郭任远闹风潮,有一天翁文灏来谈,说陈布雷有推荐我做浙大校长之意,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考虑一个时期后,决计去试做一年,得蔡先生同意仍兼气象研究所职务。当时我以为自己能力可以为故乡办好一个学校,但实际上还是要向上爬,因此更进一步为反动政府去服务了。”<sup>[29]</sup>人人都希望自己上进、进步,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也,怎么就是“向上爬”(这个词多么龌龊)呢?向上爬丑恶、卑鄙,向下爬就美妙、高贵了?为中国、为中华民族办科学、办教育,怎么就是“为反动政府去服务”呢?难道在民国时期大家都罢工、都睡大觉就是政治觉悟高,就是站稳了阶级立场,就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革命派了?

竺可桢还把自己描摹为一个充满“虚荣心”的浅薄之徒。他说:“我在哈佛大学时代有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在研究院学理科的。这时在康纳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设了一个科学社,出了一种月刊叫《科学》。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任鸿隽、杨铨、赵元任、胡明复,于1914年统转到哈佛大学,《科学》月刊编辑部也就搬到剑桥。我也做了《科学》月刊编辑人之一。当时国内政局极为混乱,我们提出科学可以救国的口号。但是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为科学做文章,好名的虚荣心是占极重要的成分的。”<sup>[30]</sup>谈到大学毕业后接着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他又说:“那时留美官费以五年为期,我应该于1915年归国,当时为了我要获得博士头衔的虚荣心,所以一再展期直到1918年的秋天才回国。”<sup>[31]</sup>为《科学》撰稿,本是为在国人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推行科学方法、弘扬科

学精神、理解科学价值的，主要还是出自爱国心和使命感，怎么就是“好名的虚荣心是占极重要的成分”呢？继续深造是每一个有上进心的学生的正常举措，是奋发有为，怎么又是“虚荣心”作怪呢？即便有点所谓的虚荣心乃至成名成家的心理，对于处于进步中的青年人来说乃是自然而然的现象，甚至可以在继续进步中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的错误或过失，只要他以后能够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名副其实就行了。成实至名归之名，成学富五车之家，对人类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不为？

竺可桢也把自己描写成爱面子的人：“关于入党问题，这是一个我一向不敢提的。第一，觉得自己政治水准太低，第二年纪快要七十了，所以有点望洋兴叹的样子。……请大家把为当作一个小学生看待，因为我政治水准低，至多也不过小学水准。所以要我做到有做党员资格，好像入大学，还有漫长一段路。但我仔细分析，这统是面子问题在作怪，要争取入党，怕不及格。”<sup>[32]</sup>爱面子人皆有之，这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正当行为，只要不过分即可。要不，难道不爱面子，损害自己的体面，让人瞧不起就正确了？难道脸皮厚，不知廉耻就高尚了？至于政治水准，并不在于嘴不离马列主义、毛泽东语录，声嘶力竭地呼喊政治口号，满口鹦鹉学舌般的官话、套话，而在于切切实实的行动。竺可桢当年回国热心开创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在国难当头时呼吁学生积极为国为民服务，面对强权和危险想方设法保护受政治迫害的学生，那才是政治水准高的表现。竺可桢在交心时所说那些话，实在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太低，显得太妄自菲薄了。

那个时代做检讨的人，不把自己说成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就是检查不彻底，检讨不深刻，革命群众绝对不善罢甘休，一定会使出“宜将剩勇追穷寇”劲头，把你批得体无完肤。竺可桢也数次把自己描画成“自私自利”之人。除了前面引用的在哈佛大学养成“以自由为名而趋于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外，他还提到：一战时“中国虽没有派兵到欧洲，联合国却招募许多山东省工人到法国后方工作。留美中国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征求中国学生去法国为工人做英文翻译。我那时虽正在预备博士论文，却自告奋勇地报了名。我回想当时的动机如下：一是好奇心，因为我过去没有到过欧洲，趁此机会可以一广眼界；二是我虽读过法文，只能勉强看书，不能讲话，去法国可以学会讲法国语言；第三，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总之我那时想去法国的出发点还是以自私自利为前提的。”“我做了十四年的气象研究所所长，最后六年是兼着浙大校长的。……我在1936年接任浙大校长时早应物色一位学物理的人继任，但为自图便利起见，我仍继续兼了七八年之久，这不但是自私自利，而是学术上的垄断作风。”<sup>[33]</sup>熟悉当时历史状况和背景的人都能够判断，他自告奋勇报名赴法做译员夹杂多少自私自利的成分，他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主要是出于工作需要还是出于自私自利。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倒不必斤斤计较别人看得起自己，关键是要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能自我作贱、自我作践。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起，那么别人怎么会看起你呢？但是，要自己能够看得起

自己,是需要拥有底气、骨气和胆气的,也需要坚信未来的真理必定在自己一边。否则,就只能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俯首听命,任人摆布,被权势当猴耍了。

### 三、觉悟提高后的新认识

竺可桢认为,解放以前他在几个观点上的认识是严重错误的,主要是科学救国、贤人政治、人性本善、个人自由主义。通过历次政治运动,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思想改造,从而站稳了阶级立场,提高了阶级觉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党的关怀,虽是愚钝,思想上仍有所提高。”<sup>[34]</sup>下面,我们看看他在觉悟提高后对这四个问题的新认识。这些新认识无论从过去的角度看,还是从现今的视野看,都是成问题的;而他原先以为是错误的观点,却包含真理的颗粒。

(一)关于科学救国。“科学本身不能救国,必须首先弄清为谁服务。列宁说,从前全部人类职能创造,只是为让一部分人获得全部技术文化成果的利益,而使另一部分得不到迫切需要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技术变为全民的财产。”<sup>[35]</sup>“‘科学救国’是五四时期许多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口号。但从袁世凯称帝到蒋介石当权,不但科学很少进展,而且即使利用科学开发一点资源,也是为外国商人或孔宋四大家族攫夺而去,于国家毫无补益,如淮南煤矿即其一例。这已经足使我感到科学救国只是一个幻想。解放以后从知道自然科学本身虽无阶级性,而科学工作人员却是有阶级性的。因此科学本身不能救国,必须弄清为谁服务的问题。……科学救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sup>[36]</sup>

确实,单靠科学不能救国,不过无论单靠哪一种手段同样不能救国,当然包括实业、文化、教育、宪政、政党、思想启蒙、新民等等在内。只有这些手段共同发力,协调作用才行。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救国的呼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推动中国科学的建制化,奠定了科学在中国的基础,使科学逐渐深入国人的意识。科学(甚至它的衍生物技术)并不是单纯为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服务的,它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受惠于每一个人。无论在什么社会,它都是人们的公共财富,是人类共同遗产。这是由科学的本性和精神气质决定的,尤其是由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无功利性或祛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决定的。即使科学的副产品技术,也或多或少具有类似的特性:百年来汽车的普及是旧例证,而今各种家用电器的普及是新例证。这种普及与阶级和社会制度无关。

(二)关于贤人政治。“过去我服膺于孟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以为知识就是力量,要有知识才能领导。……知识阶层虽有脑力劳动者,但大部分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而剥削人的。只有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能被列为工人阶级。”<sup>[37]</sup>“只有以体力脑力劳动能自立而不剥削别人,而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得称为贤人。”<sup>[38]</sup>“知识分子之所以不适合于领导阶级,是因为一半而论,他们的政治警觉性是不高的。”“知识分

子不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不能领导群众的。”〔39〕

贤人是指有才德的人，那么贤人政治（或贤人统治、贤人治国）有什么不好？贤人政治并无不对之处，只不过是在不完美的社会里，这种理想状态很难实现而已。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化的代表，怎么会“大部分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而剥削人的”？“有知识才能领导”是正确的呀，没有知识怎么能当好领导者呢。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做领导的岂不都是知识分子。施仁政、行王道或实施民主政治，要那么多“政治警觉性”干什么？只有施暴政、行霸道或实施独裁政治，才念念不忘专别人的政，需要处心积虑树敌而斗之。知识分子往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最有可能具有深远的视野、深广的远见、深邃的理性、深刻的洞察、深沉的冷静、深挚的情怀，能够超越阶级和阶层的狭隘眼界，从人类的长远福祉和最大利益看问题。况且，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体力社会、权力社会、财力社会到智力社会迈进的过程，未来的社会无疑是智力社会，智力在社会中起中轴作用，而知识分子则是智力的化身。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工人阶级培养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使把知识分子退化为工人阶级。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这一点迟早能够达到。

（三）关于人性本善。“人性本善是我从孟子和王阳明的书中所得来的一种概念。……我在浙大就以这种观点来看待同学。所以认为每个学生是好的，除非他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坏人。解放后读《联共党史》才知道，有所谓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但是在实践中，因为过去缺乏斗争经验，我的看法仍是动摇的。”〔40〕这是“我在浙大对于学生的看法，读《辩证唯物论》才知道有所谓阶级立场，不能希望一个资本家对于对于剥削对象殖民地，或是本国的工人有什么好的意图，因为受了人性本善的观念，我的警惕性仍然是不高的，斗争性是不强的。”〔41〕“经过一年多学习以后，才知道所谓善良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有以体力、脑力劳动能自立而不剥削别人，而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称为善良。工人阶级是体力劳动者，他素来是被剥削的阶级，所以在本质上是善良的。”〔42〕总而言之，“离开阶级关系而讨论人的性善性恶，是毫无意义的。像我过去这样立场，便成为敌我不分。”〔43〕

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这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定论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前者往往仁者爱人，穷则善待他人，达则以德治国——这是国人的处世之道；相信后者往往完善法制，堵塞漏洞，遵守契约，按规则办事，不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这是西人的契约意识和法治精神。因此，无论相信哪个，都有合理性，都有其好处，不能绝对说孰对孰错。最好是不要偏执一端，而尽可能使二者互补，相得益彰。至于具体的个人是善是恶，那得因人因事而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后天所受教育、社会环境以及机遇等因素确定的，与阶级或阶层似乎关系不大。饱读诗书者可能恶贯满盈，目不识丁者却是老实巴交的大好人。资本家中不乏爱国爱民者，无产阶级中亦有地痞流氓，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队伍内部不是也出现了诸多窃国大盗吗？看来，是善是恶，是好是

坏,关键在于个人修养,在于个人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或人生观,而不在于其阶级或阶层的属性。其实,世界上处处有意作恶的人并不很多,倒是时时警惕别人作恶的人为数不少——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乃至人为的敌我对立大都由此而来。

(四)关于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是近代美英代议政治的产物。我少年在哈佛大学五年,深受个人自由主义之毒,根深蒂固。当时认为苏联为集权政治,一党专政,中央委员会把持一切发号施令,人民意志无由表达。解放后参加政协,才知道人民政权表达民意的方式。……经过这几次学习才知道,我们国家民主基础之广,远非挂羊头卖狗肉、以个人自由主义相号召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所可比拟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来源,毛主席也指出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知道了只有站稳立场,服从纪律,便可以从个人自由主义的樊笼里释放出来。”<sup>[44]</sup>

自由主义当然是个人的,是个人拥有的,没有听说有集体自由主义或群众自由主义。离开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各种“主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它只能是个人自由主义,或简言之自由主义即可,不必画蛇添足,加上“个人”二字。自由主义不是毒物,而是一种好东西。要不,人们怎么会说“不自由,毋宁死”呢?自由(以及它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即自由主义)符合人的天性,有益于个人的完美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持续进步和长远利益。谁都知道,自由主义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起码得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不损害社会正常秩序为前提。若是站在某个阶级的立场,一切从某一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服从不合理性、不合时势、教条僵化的纪律,人们怎么能够获得自由呢?这样做不仅剥夺人家的自由,至少也弄得自己心灵不得自由了。在竺可桢后半生所处的时代,在民主问题是谁在“挂羊头卖狗肉”,现在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既然“我们国家民主基础之广”,一个人怎么能够一意孤行,恣意妄为,揪出那么多右派,陷害那么多好人呢;怎么会发动史无前例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呢?

竺可桢的检讨和自白到底是真诚的抑或无奈的?文章写到此处,读者大概已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们也就无须饶舌了。《竺可桢全集》的编者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竺老之一生,‘三立’皆备。他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享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一代宗师之誉,研究水土风云,成果惠及百代,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竺老以地学为专攻,重实地考察而躬行各地,又终生奋笔不辍,著述虽多有佚失,而现尚可得各类遗存文稿约三百万字,日记约一千万字。”<sup>[45]</sup>这个评价自有道理,不过使人遗憾的是,竺可桢的思想并未一以贯之,在1950年前后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并由以主导了他的行动,以致酿成一些乖戾之举。这种思想裂变和行动乖僻不仅给他的“三立”蒙上阴影,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他的人格,蒙蔽了他的良知。这一切固然是时代的怪诞和荒诞,但是也不能完全推卸个人的责任。的的确确,这

无疑是个人的不幸和悲剧,当然更多的是时代的不幸和悲剧。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人们不仅失去了积极的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甚至连消极的自由(不为所不欲为)也不可。在这里,我们的意图和主旨不是分清个人的责任,而是汲取普遍的教训,使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怪诞之事和乖违之举不再复现。只有记取教训,知识分子才能回归中国古代士人和民国时期学人的优良传统,恢复他们的狷介风骨和高贵操守,并提而高之以至超而过之,从而给国人做出表率,使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新民、立人的目标得以实现。这才是作者撰写本文的初衷和良苦用心。

### 注释:

[1]这三篇论文的标题是:“竺可桢1950年之前的科学观”、“竺可桢1950年之前的教育观”、“思想的断裂,时代的怪诞——竺可桢1950年前后科学观和教育观诸方面比较研究”。这些论文将陆续在有关刊物发表。

[2]陈明显、罗正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9页。

[3][13][39][43]《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84、83、83-84、84页。(1952年2月,“我如何领会到知识分子须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4]《竺可桢全集》第3卷,第94页。(1952年9月,“三年来中国的科学”)

[5][15][28][31]《竺可桢全集》第3卷,第86、86-89、86、87页。(1952年7月29日,“科学院研究人员思想改造学习期中的自我检讨”)

[6]《竺可桢全集》第3卷,第167页。(1954年4月4日,“加强科学知识宣传工作——代发刊词”)

[7][18][19][20][22][23][24][25][29][30][33][36][37][40][42][44]《竺可桢全集》第4卷,第100-101,90,91,91,91,91,93,93,87,93,89,90,92,101,101,102,101,102页。(1961年12月30日,“思想自传”)

[8]《竺可桢全集》第3卷,第419页。(1958年3月6日,“致院党组函”)署名人为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

[9][11][14][16][32]《竺可桢全集》第3卷,第439,440,441,440,440-441,441页。(1958年6月11、13日,“在院‘交心’大会上的发言”)

[10]《竺可桢全集》第4卷,第25页。(1960年4月8日,“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以大协作的精神争取在短期内登上世界科学的高峰”)

[12][17][34][35][38][41]《竺可桢全集》第4卷,第83,82-83,82,82,82,82页。(1961年秋,“入党申请书”)

[21]李醒民:《评彭加勒的科学观》,北京:《科学学研究》,第2卷(1984),第2期,第19-29页。李醒民:《理性的沉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78-182页。李醒民:《彭加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版,第266-270页。

[26]李醒民:《学术的生命——〈中国现代科学思潮〉自序》,《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v-ix页;北京:《科学时报》,2004年6月24日,B3版。李醒民:《科学自主、学术自由与计划科学》,《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2008),第5期,第1-16页。

[27]李醒民:《基础研究及其社会意义》,《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年第6期,第21-23页。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卷、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536-569、639-669页。

[45]《竺可桢全集》第1卷,“前言”,第24页。

[责任编辑:陶然]